

诚实与悲剧
移民之子手记
游经坤 (Darren Yau)

恶劣的谎言藏匿说谎之人。一层一层地，它把那人从头到脚裹起来，你只能从干裂的缝隙看到些许痕迹。好的谎言则不同，它把一个人剥得精光，揭露他们生命最深层的部份，让人看见他们的牵挂、想望、欲求和爱。这种谎言是说真话的谎言。

一.

2012年春天，我的伯伯被诊断出胰脏癌第四期。我的伯伯向来健康，身手敏捷，体格很好。八零年代他从中国移民，在纽约落脚，开了一家中国餐馆，每天在厨房里超时工作，精疲力竭。辉煌绝不是大厨生涯的写照。小时候我会在一角，观看厨房最忙时的情景。他站在炉台前，同时翻炒好几个炽红的大锅，热油不时喷溅，一张张订单像飞似的递来递去：三份芥兰鸡！两份猪肉炒饭！四份左宗棠鸡！肉和酱汁火速准确地拌炒一起。直等到熄了灯，桌子都擦过了，他才会上到二楼。这所谓二楼是餐馆上头隔出来的一个狭小休息间，墙壁都沁着发霉的酱油和油。他会烧壶茶，点根烟，坐在我爸旁边，用福建乡音说着他们年少在中国的日子，一直到深夜。

我父亲家有四兄弟，家庭是他们的一切。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荡中，一家人紧紧相扣，从风暴混乱中存活下来。当有亲戚被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下到监里，全家会饿着肚子把饭送到牢房，在街上遍寻搜集可卖的铜铁金属，筹钱把人赎出来。我的曾祖父会向毛的红卫兵谎报家里有什么人，在本地的政治会议中向当权者口头效忠。在学校，孩子们会互相守望，学校的霸凌正趾高气扬地从操场走来时，他们已经接到消息躲开了。

1970年代，我的曾祖父被诬告为亲国民党者。当地卫兵冲进家里，把他拉到学校，关在一个小房间。他拒绝招认不实的口供，卫兵天天逼问他，试图从他所说的话插缝让他认供。

流言在村子里传开了，人们争说我曾祖父的不是。家族笼上深重的羞辱，村子的人不和他们说话，邻居和商家都离他们远远的，以怀疑的眼光打量他们。村里的孩子常在学校取笑我爸和伯伯：你们祖父是资本主义的骗子！有一次，我的父亲再也受不了这样的羞辱，几乎把那个折磨他的人打死，他之所以停下来，是因为营养不良的手再也打不下去了。我伯伯扶着他一跛一跛地走回家，包扎出血的拳头关节，不让家里其他人知道。

每个星期，我祖父力劝曾祖父招认那假口供。他听村民说，有人因为没有交出“对的”自白书，被人用皮鞭和棍子打死。我祖父坚持，为了保命，曾祖父应该就写当局要的自白书。况且，对全家人而言，能够团圆岂不更好？他说，一起蒙羞总比分开受辱好。

后面这个原因使我曾祖父濒于自杀边缘。身为祖父的他，听到一家大小因他而承受公开羞辱与身体上的虐待，实在忍无可忍，而终止这一切磨难的扳机就在他手中。每天早上卫兵都把一张白纸拿到他面前，要他写自白书，但他拒绝说谎，一次又一次说同样的话：他没有替国民党工作，他是清白的。有一次，轮班到一个新的卫兵，他本来就认识我曾祖父，非常同情他。“你就写几个句子就好，你知道，这样我们就都可以完结了。”我曾祖父拒

绝，严正地把他回答儿子说的话又说一次：“如果他们夺走我的清白，我这姓就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”摆在面前的，是肉体的自杀与人格的自杀，我曾祖父顽固地选择都不要。

七个月之后，他被放出来了。1979年，中国的大门终于打开了，家人做出重大的决定，远离先祖所在的家乡。他们所离开村子见证过一页页的世界历史，在血腥的世界大战前，在西方列强逼使中国打开门户前，在殖民地与诸帝国兴起前，我的祖先们就住在那里。那是一个靠海的小渔村，持守着根深抵固于中国土壤的传统。然而此时，他们像流亡者，一个接一个解下套绳，驶离家乡，迈进美国，盼望能有少暴政多自由的生活。兄弟们先到了美国，努力工作，挣得立足之地。后来，他们把我的祖父母从中国接来，一家终于又团圆了。2000年，我的祖母因癌症过世，他们痛失第一个家庭成员，经历无可回避的伤痛，剧烈的伤痛，深深的伤痛。当我伯伯被诊断出癌症时，他坐在纽约皇后区的医生诊所，那年他离开中国三十年。

二.

有充分的理由认为，我曾祖父的故事结局圆满。他还是没有说谎，能与家人团圆，最终逃离中国。然而我们会倾向于忽视故事中的悲剧人物。就因为这圆满的结局，我曾祖父所面对的两难困境仿佛就不是真正的道德困境。Alasdair MacIntyre曾观察到，“人生的真正文体不是圣徒传也不是冒险故事，而是悲剧。”这里所说的悲剧不只是可悲或凄惨的，我们所探索的悲剧较接近Sophocles诉说的故事：在他的戏中，演员被本质上相互冲突的牵挂和爱驱动，至终无可避免地走向某种层面的死亡。因此Oedipus的眼盲或Antigone的蔑视导致各自的悲剧结局，不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愚昧，而是他们各自的牵挂与爱使他们进到某种结局，从外面看来，那样的结局既是注定也是自由的。

移民的人生特别体现出这种悲剧性。离开一个世界，进入另一个世界，移民总是与所处的世界相冲突，因为他们里面的那个世界嵌得太深。有时这个内在世界是可以抹除的，例如幼小的孩童。他们的柔韧性使一个家留下的凹处可以被另一个家填满。然而他们成年之后虽然都不记得了，却还是能找到那个世界的遗迹。如同无家可归的亚当和夏娃，移民和其家庭带着一种对那破碎世界的敏锐感应；他们的世界不断被修正、谈判，不断被审问、摧毁，不断被建立与筑构。只要知道他们家族的故事，移民的子女直觉地了解这一切，因为我们故事如此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故事。原乡之根总随着我们，影响我们的道德决定，塑造我们所想要的伦理生活，即使此一生活是定意要拔除这带给我们生命的根。这样的叛逆也是一种悲剧性格。

道德哲学家常常会犯一种错，试图将这些悲剧特质从人生中剔除。齐整的道德系统用的是以理性调整平衡的变数，然而不论是道德系统、道德三段论或技术术语，通常都不能用于我们承袭自父母的故事，这些故事里浓厚而戏剧性的生活感是这些机制所无法捕捉的。这些故事像织锦画，而有些道德哲学家花太花时间专注于一根线，仿佛这一根线就足以呈现整幅图画。

有些道德主义者坚持把伦理生活当作一套规范：“不可偷窃”，“不可欺骗”，“不可说谎”。在织锦般复杂的叙述中，最后一点“不可说谎”特别有趣。在我曾祖父的故事里，

一条条交织的“说谎”之线来自不同的观点：我家族的伪爱国表现，我父亲以谎言掩盖他拳头关节流血的真相，说谎的共产党控诉者日复一日坚称我曾祖父说谎。欺骗一层层厚厚地交织在故事中，一个欺骗是因另一个欺骗所造成，又造成另一个欺骗。因为故事中有许多不同的道德扮演者，每一个行动都开启另一决定成形的可能性。若不是因那不实的指控，我的曾祖父就不会表现出他的诚信，而我的父亲也不用以说谎掩饰他的手伤。

移民特别习惯要说确定的话，而这些话的确定性又常被挑战。他们周遭的世界和內里的世界不断地碰撞——没有齐整的系统可循，没有单纯的故事可说。他们必须横渡不同的生活型态，而经验告诉他们，自己对生活的观念是没有价值的，全都是别扭、古怪、彻底令人厌恶的。然而，我却观察到移民有一种奇特的尊严，类似我曾祖父拒绝假告白时的那种尊严。当我想像他一个人被关在学校小小的房间，我不认为他是咬着牙奉行某种规定。他不是遵循说实话的法律，脑子里想着的并非：“说谎一定是错的，我不要做错的事；因此，我绝不说谎。”相反地，各种不同的道德选择缠绕着他，像许多线绳，有些是套索，有些是逃生索。

最终，我认为我的曾祖父并没有说谎，因为他努力忠于自己。他不单努力说实话，而且要当个口说实言，诚信一致的人。诚实之于他是基本的道德意识，这最基本的爱迫使他要起来捍卫、保护家族姓氏，唯一能够摧毁游家名声的就是说谎。

移民的尊严也是如此。知道自己将被丢到一个满是冲突的世界，移民试着保持一种自我一致性。在和新的世界协调时，移民不得不澄清并认定她最深的爱，紧紧抓住，因为她知道，失落了这爱就是失落了自己。然而，面对现在所处世界提供的有限且有条件选项，她又必须配合地行动。因此移民清楚地理解什么叫“受谴责而行动”，正如哲学家 Christine Korsgaard 所说的。也许，常处于冲突的世界应当存着敬意，默然反思移民的伦理。

然而，呈现这移民的画像，我无意美化它，因我所描绘的是一个在悲惨世界中求生存者的画像。也许，我伯伯在纽约皇后区罹患癌症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，要保持自我一致性和确实性的愿望有时挺怪的，甚至完全匪夷所思。它可能驱使我们做的事和我们所爱背道而驰，甚至会说一个永远不能拆穿的谎。

III.

我伯伯在皇后区的华人移民中是很有名的。他卖掉餐馆以后，大部份的时间都投入在一些帮助新移民的机构，让他们能够在纽约生存。我伯伯会为人安排工作和住所，联络朋友，安排日期，把钱借给手头很紧的人。我从来不知道他是那么受当地社区爱戴，直到看见几百个人挤进教堂参加他的丧礼仪式。我听到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赞扬他的仁心善举。有人诉说我伯伯是如何在他无家可归时帮他找到工作，另一个人见证我伯伯非常热心、很有领袖魅力。很多人都说，他们不知道他得了癌症，很惊讶他竟然过世了。

只有一位，没人给他机会因我伯伯的死而惊讶，那就是我的祖父。没有人跟他说，他的儿子得了第四期胰脏癌；也没有人跟他说，他的儿子身患绝症。丧礼后，我们把我伯伯安葬

在当地的一个墓园，我的祖父不在场。没有人告诉他任何事。当我们把花放在棺木上时，我祖父在他的公寓里看报纸，和他儿子在世时所住的房子只隔两条街。

丧礼前几个月，我父亲和兄弟们聚在公寓里讨论我伯伯的病。那时，医生已经通知他们，他所剩时日不多了。因此，四兄弟集思如何预备他的离世。当他们讨论到丧礼细节时，我父亲问了一个尴尬的问题：“那，我们什么时候要跟爸爸讲？”兄弟们哀思地看着我伯伯。“我们不跟他讲”我伯伯答道。

一场舌战展开了。一方面，我伯伯顾虑祖父的健康，向他父亲隐瞒他的癌症治疗。我的祖父九十多岁了，耳朵重听，不能走太多路，常常生病。除了盯着窗外，他的时间大都花在读中文报纸或写些小纸条给孙子们。我的伯伯说，如果告诉他父亲他得了绝症，只会毫无必要地使他父亲担忧。中国的孝子应该时时尊荣父亲，儿子的软弱与苦难成为父亲的重担，这是不孝。更严重的是，这消息可能使他震惊致死。因自己的苦难而杀了父亲，这是大逆不道。不告知而死去，远胜过羞辱那把你带来这世界的人。

我父亲坚决认为这样不诚实。“难道爸爸不应该知道他的儿子快死了吗？我们不能至少让他来参加丧礼吗？”然而我伯伯的意见获胜了。越临近他的死，他带给父亲的震惊会越剧烈；越临近死亡，不孝的羞辱就越大。“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最好都保守这个秘密。”他坚决地下了结论。其他兄弟们都点头，我父亲也很不安地同意了。他是兄弟中小辈的，兄长的权威压过他，抗议是无效的。因此，丧礼的举行我祖父毫不知情。接下来几个星期，其他的兄弟们小心地不让祖父发现。他们把他的报纸换掉，这样他就不会看到当天报纸上长长的讣告，又告知来访的人老人家身体差。偶尔，祖父会问起我伯伯去哪儿了，回答总是他有点生病，或出差去了，或忙着照顾新生的孙子孙女。我祖父九十五岁生日那天，伯伯透过其中一个兄弟，致上最诚挚的歉意，说：他在地参加一位好友的丧礼，赶不及回来为他祝寿。直到如今，我祖父还是不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。

当我跟学校的朋友说到这故事，他们都深感不安。“真的好奇怪，”有个朋友说“你爸爸为什么不就告诉你祖父？”我努力地抓些话来回答，试图解释荣誉的重要性，还有儿子应当对父亲表现的那种特别孝道。“你知道，”我说“他们别无选择。”我的朋友们困惑地搔搔头。他们的表情告诉我：我们认为有别的办法。

又一次，我问另一个朋友对这件事的看法，他冲口就说：“你伯伯不是对他爸爸说谎吗？”“我猜是。”我沉思。“说谎掩盖这么重要的事，这不是不对吗？”我反问：“害死你的父亲不是更糟糕吗？”我的朋友奇怪地看着我，他找不到话回答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我觉得这就是不对。”然而他的理由都掉落到谷底。

事实上，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和我父亲角力过很多次了。几度激烈谈话中，我们从头到尾过滤剧本，试图找出其它替代方法。每一次翻遍这剧本，我们都体认到，实在没有什么转圜的空间。对故事中的人物而言，唯一讲得通的，就是向我祖父隐瞒真相。

奇怪的自相矛盾情境：我在中国的曾祖父和我伯伯都是诚实的人，却一个说谎，一个拒绝说谎。他们都努力忠于他们最深挚的爱与牵挂；他们都极想维护家庭荣誉，但所处的情境

让他们的诚实行动不同。诚实是：有时硬梆梆、苦恼不安、没有弹性、勇敢的；有时，出于至深恒久的爱，它会说个永远的谎来解脱苦难，为了爱他人而否定自身存在的谎。

我所看到的是，这样的两难困境呈现紧扣着移民人生的悲剧，就某些方面来说，也是所有人类的悲剧。当人从一个世界迁移到另一个世界，他们随身带着另一种人生型态的精神和理性。当这移民带着这些思维方式进到我的世界时，我，身为美国人，总是想要对他们呐喊：“一定有别的办法！”仿佛我的话可以轻易地延展他们的地平线来融于我的。我想要告诉我祖父，他的儿子快死了，他因为太爱他，不忍他受苦，选择用谎言永远向他隐瞒。我想要告诉我伯伯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我们必须信得过我祖父，相信他听到癌症的消息不会有太惨的反应。但我的父亲哀伤地说，“儿子，你说的我都听见，但这对他们是说不通的。”

把这样的故事看为悲剧，好像没错。其结局是，一个父亲在他纽约的公寓啜饮着茶，而他的儿子已经入了土。然而诱惑在于认为我们的故事不是悲剧，因为我们能够隔着距离思考别人的故事，如我所说的故事。倘若我们必须踏进另一个世界，就像我们当中的移民、寄居者或难民，我们就会从对方的观点看见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可避免的悲剧层面，因为我们的爱与牵挂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某些行动，并抑制其它可能的方式。这时移民会告诉我们：“一定有别的办法！”而我们会说：“你说的我都听见，但这对他们其他人是说不通的。”反过来，我们也一点都听不进移民所说的。

移民是一份礼物，送给他们所处的文化，因为他们带出潜藏于社会中的张力。奥古斯汀，著名的北非基督徒主教，观察到人类是因他们的爱而有动机。在这些爱底下，人可以感受到一种对家的原始渴望。家，心之最终向往。由于各式各样的人对家有各种不同的感受，世界就充满各样的冲突；不同的爱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。

踏上他们的船，移民完全知道这家的意识。它嚎啕呻吟，因被连根拔起，投入海中。抵达新世界，移民在我们看来是外国人、异乡人、流浪者，带一个奇怪的世界来到我们的世界，不同的爱造成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他们一到，就硬生生地面对严厉的差异性，两个世界注定要发生的碰撞让移民衍生出一种伦理，他们之被延伸，是在家乡从未有过的。

这伦理试图在交战的世界和无法控制的环境中，维持一致性的些微闪光。在一个不总是友善相待的世界中，它寻求忠于一个人最深的爱。这伦理是移民送他们新世界的礼物。如果我们够敞开欢迎，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接受这礼物，聆听一些智慧；如果我们够勇敢，我们甚至会仿效它。若我们目前时代被标上激进民族主义的幽灵，若各国要杜绝丑陋爱国主义的獠牙，那我们就必须不只保护移民，更要从他们学习。他们的伦理是在悲剧的烈焰中铸成的。这是个礼物，送给那些感受到世界在分裂中的人，有足够勇气踏入风暴未来的人，要寻求真实，即使有时必得说个谎。